

第一章 列强染指榆关告急 自辟口岸权益失控

榆关即古榆关，泛指临榆县（治所山海关，今属秦皇岛市）境内的山海关、秦皇岛沿海地带。这里依山傍海，甬道狭长据险，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自古以来，榆关及其沿海地区，是个丰足富庶的“天府胜境”，车轮辐辏，四通八达；扬帆直指，海外通途；商贾络绎，军民咸便；民族杂居，文化融汇；是个兵家操戈必争的重地。自明至清，无不视为拱卫京师的屏障。但清初一统天下后，官民乐居思安，城防海防一度松弛。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外国殖民主义者推开后，清朝统治者尽管一度加强了京畿辅地天津大沽口至山海关沿海一带的防务，但也未能阻挡住外国侵略者由南向北咄咄逼进的势头。侵略者的魔爪先是伸向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口岸，随后是营口、天津和烟台，进而强占旅顺、威海卫军港和大连、青岛两通商口岸。特别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海疆多故，主权丧失殆尽，唯山海关、秦皇岛尚在独守空门。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作为京畿冲要的山海关和畿辅通海门户的秦皇岛口岸，早已使列强垂涎欲滴，妄图染指其间，形势岌岌可危。

一 关隘海口欲靖难靖 列强觊觎险不胜险

1840（清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侵扰榆关沿海地区。虎门销烟及英国政府在悍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蓄谋染指临榆的

山、秦两地，并加强了袭扰该地区的频率。其侵华舰队司令懿律亲率舰队北犯渤海湾诸海口，多次窜扰榆关沿海。8月，英国海军，派铁甲巡洋舰一艘闯入山海关老龙头海面，于近岸处住锚，囑护卫艇沿秦皇岛、老龙头海岸线游弋，探测港湾及“海口出人途径……工于绘图之人随处测绘。”时因山海关守将按清廷谕令“如其进口登岸，即可奋力歼除”行事，英国侵略军未敢贸然登陆内扰。是年秋，英军舰由白河口（白河，即海河，其河口即是大沽口）窜入昌黎南境近滦河口处的狼窝口，英兵登岸，骚扰百姓。翌年1月，虎门炮台失陷，战火北延，英军舰船袭扰榆关沿海港湾的次数明显增多。懿律为实现其扩大军事侵华计划，曾直言不讳地要求清政府官员允许他前往山海关观赏古迹，并道出了他对这往古以来海陆冲要之区，感到异乎寻常的“兴趣”。

为此，道光皇帝多次谕旨：令军机大臣督协山海关副都统扎拉芬泰筹防；钦派军机大臣理藩院尚书赛尚阿会同新任直隶总督讷尔经额（1840年由陕甘总督调直隶总督，后任文渊阁大学士）查办自天津至山海关一线海口防务；命派直隶总督调提周悦盛统带提标兵800名、山永协（山海关——永平府防兵，驻山海关）、三屯协（驻迁安三屯营）两协兵各500名火速增援秦皇岛沿海“最为紧要”口岸。然而，就在道光皇帝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月22日谕旨赛尚阿的同一天，英军舰3艘，满载“有陆路兵丁各色”，在秦皇岛、金山嘴一带海口港湾进行挑畔，“或游弋或停泊”，频繁骚扰活动每日长达10多小时，连日不断，以牵制清政府调兵遣将南下广东。是年，5月27日（农历四月七日），《广州和约》签订，英国在勒索

《筹办夷务始末·清道光朝》。转引自《水运史丛书》，《秦皇岛港史》上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筹办夷务始末·清道光朝》，卷19。

（1840—1841年在任，后召京，先后任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1860年8月卒。注：将军职同八旗制都统等级）

《筹办夷务始末·清道光朝》，卷21

了巨额赔款后，旋即撕毁“和约”，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英国军舰北犯榆关沿海最多时高达六、七艘，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再度告急。清廷加派一等钦差、都统哈良阿火速驰援秦皇岛；调提标镇协兵、吉林兵和黑龙江骑兵等赶赴山海关，同时增设远、近炮台。截止这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僧格林沁、赛尚阿和护军统领巴德清等，先后统带亲军到秦皇岛、山海关巡视海防，进行实战演习。据不完全统计，清军在榆关沿海一带除原驻守军以外，驻扎援军官兵总数已逾万人，仅山、秦两地就增设各种火炮 221 门。海防力量得到加强后，京畿东隅暂时绥靖。

可是到了 1850 年（清道光三十年）6 月，一艘不明国籍的武装舰船突然闯入山海关老龙头海面停泊，数十洋兵分乘舢舨登岸，“窥视山海关虚实，其心叵测”。外国人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当地官军百姓的义愤。据《临榆县志》载：山海关守军把总郭承恩只身前往拒敌，在小湾庄拦住洋人，骄横跋扈的洋兵无视把总，双方通过“交手较力”，洋兵力怯，怀疑清守军已有准备，遂不敢妄动。郭承恩的果敢举动，后人传为佳话。

1856—1860 年（清咸丰六至十年），英、法、俄再度侵扰榆关。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津、京陷落。英、法、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独立主权又一次遭受严重损害。外国侵略者并没有因为攫取到种种利益而满足。恰恰相反，英、法、俄借势加紧对榆关沿海禁地的窥视和袭扰。1858 年（清咸丰八年）6 月初，《天津条约》正在谈判之中，英、法军舰 3 艘编队游弋于山海关石河口海面，企图以强大武力威慑清廷在谈判桌上就范，但榆关清驻军骑兵严阵以待，迫使侵略者无法登岸。次年 6 月，老龙头水域又出现了 3 艘英、法舰船，连续三天驻泊不撤，并派舢舨沿海岸东面窥测，“丈量水势，插记标志”，但经清防军“善为阻回”。敌舰各鸣炮三五响示威后，“驶往秦皇岛海湾停泊”，登上秦皇岛西北高

《临榆县志》，民国版。卷 18。“事实篇，宦迹·郭承恩”。

地——白塔岭“察观地形绘图”，胁迫百姓“询问永平府（治所在卢龙县城）、昌黎、乐亭各府县相距远近”。此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英法联军舰船 20 余艘次连续武装示威和侦察了榆关沿海老龙头、秦皇岛、汤河口、金山嘴、戴河口、洋河口、蒲河口、老母沟、滦河口、清河口、祁河口及刘家河口等。特别是中国与英法联军交战之际，英法与俄相互勾结，觊觎着秦皇岛至金山嘴良好港湾，进一步引起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关注。当英法联军舰船测量秦皇岛港湾地势时，混迹于英国船中的俄国军官，被驻山海关黑龙江籍守军官兵认出，揭露其是 1858 年（清咸丰八年）在黑龙江办理过中俄边境事务的官员。可见他们狼狈为奸，在中国“非通商口岸之海口游弋、观测”，肆意侵犯和践踏中国主权的行径，充分暴露了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持所谓的“中立”立场及其扮演“调停人”的伪善面目。

1860 年（清咸丰十年）初，天津战事复起，鉴于英法舰船由天津白河口北犯昌黎、登岸强索给养，被当地严阵以待的军民奋力驱回等事实，一方面榆关沿海始终处于禁严状态，为加强防御能力，僧格林沁亲察原海防虚实，增调兵将 2000 名派驻山、秦两地以厚兵力；另一方面当地各界人民同仇敌忾，积极备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千上万的民工帮助官军修筑城防海防工事，固营垒修，栅栏，筑炮台，所有的海口要冲都有兵民共同抵御来犯者。

正当中国军民反对外国侵略士气高涨的时候，清廷政策却出现 180 度的大转弯，例如多次谕旨严饬各路统兵、镇将暨弁兵等，不准“遇夷即战”，不能“不顾剿抚大计”。所谓“剿抚大计”，不过是对内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对外开门揖盗、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清朝统治者的这“种反动”政策，不仅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

① 《筹办夷务始末，清咸丰朝》，卷 41，第 1564—1579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清咸丰朝》。卷 41，第 1564—1579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清咸丰朝》，卷 41，第 1564—1579 页。

动，而且为侵略者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大开了绿灯。

1868年（清同治七年）8月，英国军舰驻泊于山海关南海海面，其水师提督都克斯一行4人，登岸前往山海关都统府，声称大英帝国协助清军“剿捻”有功，受到副都统长善（1865年2月任，1868年12月授广州将军）的“殷勤款待”；都克斯遂回邀长善于军舰上，“罗列酒果招待”，同时操演舰炮，借以炫耀英国皇家海军强威。事后，长善奏报清廷竟然称英国人此举“礼貌甚属恭顺”。这一事件的发生，开创了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首次公开侵入京师门户，即山海关、秦皇岛沿海禁区的历史先例。接着，法国军舰闯入“禁区”也有过类似举动。充分暴露了侵略者对榆关海陆冲要之区的觊觎之心，和北方沿海门户难保的危机之势。

二 榆关海防要务强固 马关签约后患无穷

中英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及《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其欲逐逐”。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大大加深。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公开提出“富国强兵”“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对外扩张侵略的“基本国策”，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中法战争（1884~1885年）后日本军国主义更是看到清朝政府的软弱可欺，于是制定出“十年扩军计划”和确定了“作战大方针”，即以主力在山海关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以达其征服中国全土之大业。据载：至1890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0%，而1892

《筹办夷务始末·清咸丰朝》，卷41，第1564-1579页。

转引自中国军科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二册，第120页。

摘自《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三册。

贾逸君：《中日甲午战争》第19页。

年高达 41% 强。

与此同期，清政府为应战日本亦做了必要准备。自日本 19 世纪 70 年代的琉球事件和武力进犯台湾以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对日本的狂妄野心有所警觉，并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开始注意加强防御能力。当唇齿相依的朝鲜发生“壬午兵变”（1882 年）“甲申政变”（1884 年）之后，进而明确了“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的认识。并且鉴于中法战争的教训，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措施，作为“当务之急”和“久远之图”，采取了筹办海防、建设海军、整饬陆军、改善武器装备、修建铁路和通信设施等一系列实际步骤。

清政府视“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为第一要务”，将李鸿章之北洋海防置于重点防务地位，以“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自 7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李鸿章特别关注山海关后援海防建设：一是调兵遣将“严密布防”。采纳曾国荃关于直隶海防不宜远守营口，宜以重兵守山海关的建议，先后调宋庆（四川提督）、郭松林（直隶总兵）二军分驻蒲河口、秦皇岛等处；又以鲍超率全军 30 营驻冒黎、乐亭，防守大清河、洋河、戴河各口，以原山海关防军兼顾老龙头、秦皇岛、金山嘴各至要之区。至 1884 年（清光绪十年）乃命曾国荃统帅的安徽、湖北、山西各军赴山海关驻守；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练军驻山海关南海，并设“行营武备学堂”培养军事指挥人才。二是修筑坚固永久性炮台和组建“水雷营”。1882 年（清光绪八年）山海关内外筑有三合土火炮台一座，土炮台二座，濒海营墙，均防炮台建筑。又宁海城临海受敌，于炮台墙外，悉以沙土掩护”。又于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经新成立

〔日〕松下芳男：《近代日本军事史》。

李鸿章：《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李文忠全书·奏稿》卷 17，第 54 页。

转引自《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二册。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十四。光绪三十一年刻本。

中国军科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二册，第 131 页。

散见：《清史稿》、《筹办夷务始末·光绪朝》等。

赵尔巽：《清史稿》。卷 138·第 4100 页。

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准，于山海关设置水雷营，营有官兵 108 名。1887 年（清光绪十三年），令新任直隶提督郭松林驻秦皇岛“勘桑海口”；分驻营垒。添筑炮台”。1890 年（清光绪十六年），于山海关改建增建宁远城之“定远”、铁门关、之“清远”、老龙头“镇远”等三座永久性炮台，其“台垣俱是巩固”^④。三是架设电话、电报。80 年代中期，清政府拨银 31961 两，架通北塘至山海关的北洋第一条电话线路。又拨银 107316 两将线路延至营口，使其北连奉天，南达旅顺，并通过津沽与济南、上海、烟台、威海联网。90 年代初，增设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海滨电报局。四是修筑津榆铁路。在筹办海防时，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劻及北洋大臣李鸿章等多次片奏光绪皇帝，请求速办津榆铁路，强调“近畿海岸自大沽、北塘以北约五百里防营太少，究嫌空虚，如有铁路相通，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甲午战争爆发时，津榆铁路修通对改善海路联防之态势，增强沿海军事运输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上述情况，日本军国主义针对中国的“十年扩军计划”已进入临海状态，而大清帝国自有筹议海防之举，北洋海军可谓“铜墙铁壁”，近畿沿海中腹后援之地的榆关亦为“固若金汤”。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对自己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和海防，进行了最后一次会同校阅，1894 年 5 月 21 日（清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到校阅最后一站的山海关进行了海、陆联合作战演习；回京时又视察了津榆铁路。为此，李鸿章对北洋防务表示满意。但能否拒敌于国门之外？尚不容乐观无忧。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明治二十七年）7 月 25 日，在英、

李鸿章：《覆陈海军规模，筹办船坞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海军函稿”卷一。

、赵尔巽：《清史稿》卷 138。

李鸿章：《北洋电线报销折》（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 131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军司令部：《清末海军史料》。

美等国支持下，日本制造借口不宣而战，在朝鲜半岛海域袭击中国远兵船。随后进犯牙山清驻军。8月1日，清廷被迫下诏对日宣战。同一天，日本对华正式宣战，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在日本方面，按照战时大本营“作战大方针”的战略思想，首先派一个陆军师团进占朝鲜，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待机攻取辽东半岛，占稳脚跟；海军则以联合舰队击破中国北洋舰队，迅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控制海上运输线，进而在山海关及秦皇岛口岸登陆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决战。

在清政府方面，战前虽有筹议海防之议，但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由于政治腐败和内部帝党与后党的战与和之纷争，致使清廷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全局。因而战前既没有组成专门作战指挥机构，又未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战争伊始，清廷寄希望俄、英等国的所谓“调停”，李鸿章坚持避战静守的方针。当时朝鲜形势极度紧张，全国舆论和清军某些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积极抗战时，主和派既不敢公开反对，又不愿认真备战，直至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下诏宣战。在宣战诏书上提出了“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明确以山海关为后援，以奉天为前线。“著李鸿章（主和派）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员，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根据此方针，决定调陆军赴朝，称在平壤集结，然后南下驱除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在朝清军，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

尽管如是，未能改变清政府初战失利局面。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月钦派奉天提督叶志超、直隶提督聂士成及提督吕本元等亲率的四支援军先后赴朝；任命败军之将叶志超总统平壤各军。9月吉志超集结浙江提督马玉昆所部毅军，总兵丰升阿、卫汝贵所部盛军

和总兵左宝贵所部奉军等计 29 营 1.4 万余人，在李鸿章指使下，不思“相机进取”，“直指汉城”，却在平壤“置酒高歌”，坐待日军进攻。9月13日（八月十五日），四路日军围逼平壤，叶志超率守军仓皇应战未成，只好撤军，先败走平壤，后放弃义州，又被迫撤回鸭绿江西岸。9月17日（八月十八日），日本联合舰队觅得北洋舰队驰援朝鲜返航旅顺口之机遇后，于黄海北部以其相对优势战胜了北洋舰队。黄海海战清军失利，损失惨重。北洋舰队以“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为代表的广大官兵在艰难情况下能够奋勇拼杀的英烈事迹，是值得后人称颂的。10月至12月间，辽东辽南战火纷扬，昏庸无能、避战自保的李鸿章淮军势力，遇敌则每战必败。安东（今丹东）、山由岩、辽阳、金州、大连、旅顺、盖平（今盖县）、海城等相继陷落，奉天也危在旦夕。

旅顺、海城失陷，关外军情更加紧迫。11月23日（十月二十六日），鉴于李鸿章“调度乖方，救援无力”，清廷下诏将其“革职留任”津沽，以阻日军直逼京畿。同时决定启动所谓主战派湘系最大军阀、两江总督刘坤一替代李鸿章淮系势力，坐镇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四川提督宋庆（已在海城前线）为副统帅。1895年1月1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乃令新授钦差大臣刘坤一，迅速进驻山海关调度、节制屯驻关城内外各军尚存的20余万兵力（400余营）；令自动请缨的吴大澂统领新疆布政使魏光燾部新湘军、总兵刘树元所率抚标军、吴元恺所率恺字军等，“即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与宋庆等军会合，相机进剿”。未几时，在山东，2月12日（正月十八日）威海卫及刘公岛失守，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在辽宁，宋庆集结百余营兵力，约6万人反攻海城非但未果，反而又让日军相继轻取营口、牛庄、田庄台等重地。宋庆、吴大澂数万大军退守锦州以西至山海关一线，巡抚吴大澂在战场上不战自退，当了可耻逃兵。

〔英〕胡兰德：《关于中国战争的国际公法》。转引自《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二册，《军机处电寄吴大澂谕旨》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8，第17页。

2月中下旬正值《马关条约》谈判时，日本战时大本营任命“征清大总督”和决定以其全部野战师团（共8个师团）深入侵华战争，准备登陆山海关。然而，让刘坤一坐镇山海关，是清廷的一大错谬。坤一其人原是个没有指挥打过一次仗的统帅，当时有人说他：“屯兵于关门而毫无振作”，又有人这样描绘他：“刘坤一驻山海关，一日讹传倭兵至，坤一惧而三徙，共悖谬如此”，。

辽宁半岛沦陷，北洋海军覆灭，榆关战火迫在眉睫，同日本决战直隶平原前途未卜。清廷决定同日媾和。实际上，早在平壤，黄海两战之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主和派就企图借战败重开和议，要求英、美、俄、德、法出面调停。当日军侵入辽东半岛后，西方列强出于维护自身在华利益，才开始进行干预。不久旅顺陷落，清廷大震，加之全国舆论压力，以及对日本政府初步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难于接受，不得不一面求和，一面备战。特别是威海失守，北洋海军覆灭后，京津危急，清廷决计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转告日本政府，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授与一切全权，赶赴日本下关媾和订约。在日本方面，虽然已准备在直隶平原进行决战，但首相伊藤博文等毕竟看到了日军“大举出征”，本土“防卫几乎撤尽”，是无视列强干涉的危险行径，因而极力主张在充分攫取侵华利益的情况下，同清政府全权代表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屈辱求和激起全国人民极大不满。然而，昏庸的清朝统治者却看不清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更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抗日积极性，在敌国的军事进攻和外交讹诈面前，迫不及待地期待媾和了事。《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人民留下痛切思悲的历史难忘一页，而且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必然殃及中华民族之存亡，它日弹丸之地的榆关必定要遭劫难。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502册。

②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96页。

③ 摘自中国军科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二册第198—199页。

1895年4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亦称《中日讲和条约十一条》）签订。它的签订是以中国作为战败国为前提条件的，是清政府采取妥协投降方针的必然结果。这个条约是中日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副枷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领土丧失，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完整。助长了帝国主义列强肢解瓜分中国的野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二是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债台高筑”，转嫁危机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三是允许帝国主义在华设厂开矿筑路，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为主，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急剧加深。

庚子（1900年）事变前夕，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明争暗斗，逐步形成了以英、美、日为一方，俄、法、德为另一方的几个大国互相争霸的复杂局面，其中又以英、俄之间的争斗最为激烈。但是它们之间争霸的目的是一致的。《马关条约》签订，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出了“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的狂叫时刻，它们竭力鼓吹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迅速将中国“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仍是块绝好的肥肉，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争相而又一致地吞噬对象，“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界）中国领土”，在行动上“开始瓜分中国了”。

《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英、美两国为箝制俄国南下，或明或暗地支持了日本对华的甲午战争。从而进一步挑起了沙俄独霸东北的欲望，于是沙俄联合法、德对日采取了“三国干涉还辽”的坚决行动。沙俄以大清帝国的“恩人”自居。1896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沙俄于彼得堡威逼利诱李鸿章，李遂于莫

〔苏〕鲍 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1955年俄文版，第34页。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页。

斯科秘密签订了又一卖国条约——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其约打着“军事同盟”幌子，以共同防御日本为诱饵。欺骗和愚弄了清政府，使中国东北三省幅员轻易断送。就此沙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抢先了一步。

沙俄的行径空前加剧了列强在中国的争夺。继俄之后，法国亦得了滇边陆地，及广西镇南关至龙州铁路权，并辟河口、思茅为商埠，与清政府订了专约，也算有了报酬。唯独三国干涉还辽中的德国，未得谢礼，隐自衔恨。其时，德国早在注意到山东的胶州湾。胶州湾“作为港口而论，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优势性”，德国亟欲占领，以便建筑海军基地和货物进出港口。1897年11月13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德国借口本国的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即曹州巨野教案），派兵舰占据了胶州湾（一称胶澳）和炮台。次年3月6日（二月十二日），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又称《德租胶澳专约》），不仅在“租界”的名义下，强占胶州湾，约开了青岛港，而且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开采矿山和修筑胶济铁路，以及在其它方面投资等一系列特权，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

接着，俄国在《中俄密约》的规定中，原本应该得到胶州湾，而没能如愿以偿表示不满。1897年12月15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俄国一方面派兵来华，以四五十艘船在中国海口游弋；另一方面贿赂李鸿章等，诱迫清政府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3月和5月，分别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及《续约》。^③根据条约，沙俄不但强行租占旅顺口、约开大连港和取得全权管辖旅大地区及其附近水域的权利，并取得了从中东铁路向南延伸至旅大的筑路权。次年，沙俄竟擅改租借地为“关东省”（有的亦称“关东州”），不仅霸占我辽东半岛，而且把东北全

张春初：《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7页。

r)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8—742页；第754—755页。

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沙俄并不以此为满足，进而叫嚷：“我们将依据历史的道路走向南方”^②。为此，沙俄伙同比利时和法国，又取得修筑正太铁路（正定至太原）和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的投资权，把势力渗透到华北和长江流域。同时沙俄又积极支持法国在中国西南地区扩张势力，力图构成南北夹攻英国的有利形势。法国于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强迫清政府宣布不把海南岛割让与他国。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1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四日），法国又逼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在广州湾建立了海军基地，攫入了滇越铁路和广州铁路的修筑权，并划广州、广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

英国为了保持自己的侵华优势，以俄、法的扩张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为借口，在1898年初，利用军事恐吓，强迫清政府不得将长江流域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并强求始终聘英人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③是年5月，英国通过英福公司与山西设备局缔结了山西采矿附设铁路条约。用白银1000万两借款将沙俄已抢到手的正太铁路修筑权夺到自己手中。不久，英国为了北与俄国抗衡，南与法国对峙，在《中英南京条约》和《中英天津条约》及《中英北京条约》的基础上，趁势于1898年6月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和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约》，强租九龙半岛及香港附近岛屿。紧接着，7月1日（五月十三日）逼签《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④，索租威海卫军港。从而英国侵略者分别在中国南北海岸建立了海军基地。8月7日（六月二十日）英国在原投资借款并实际参与了管理天津——山海关铁路（即津榆铁路）的基础上，又向清朝政府提出修筑山西——河南——长江沿岸、天津——镇江、广州——九龙、上海——杭州——宁波、浦口——信阳五条铁路。几经交涉，除津铁路

〔俄〕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第61页；转引自廖一中等编《义和团运动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29—930页；第731—733页。

④、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69页；第782—783页。

北段由德国修筑外，其余全部接受了英国要求。紧接着，英国为在俄国独霸的东北地区打开一个缺口，争揽到山海关——牛庄铁路的借款权；同时，借秦皇岛自开口岸开埠之机，将魔瓜伸向开平煤矿和秦皇岛港，达到抑制沙俄西进入关和在北方建设起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出口基地的目的。

日本迫于三国“干涉还辽”后，在英国极力拉拢和支持下，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4月胁迫清朝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英、日、美在联合对抗沙俄共同侵华主面，关系日益密切。英国在争夺在华势力范围中，不但巩固了自己侵华的优势，而且将沙俄的势力压到长城以北。这使沙俄大为恼火，双方在激烈争吵之后，于1899年4月28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达成协议，签订《英俄铁路范围协定》，以山海关及长城为界明确划分英俄两国的铁路投资范围，东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相互不谋求关外和关内的各自在华权益。这个协定，是英、俄两国既争夺又勾结的暂时妥协的产物。协定签订后，英国全力经营长江流域，千方百计不容他国染指。而沙俄，也集中精力在东北扩张势力。到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底，中东铁路筑成近1000俄里的路基。有的区段已铺设了路轨，并计划将哈尔滨建成铁路枢纽的中心城市，把大连建成远东的第一大商港，将旅顺口建成为坚固的永久性战略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从中英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40余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英、法、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约开通商口岸达23处。而到了甲午战争以后的5年（1895—1899年）间，包括英、法、俄及新加入的日、德等约开通商口岸计13处。前后总计36处，遍布中国沿海沿江及内陆地区。1845—1866年间（清道光二十五年至同治五年）索租租界（公共租界和专管租界）计有14处，占地面积近6万亩。到了1895—1899年间（清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新增租界9处，前后合计23处，租借地被帝国主义视为脱离中国范围的豁让地，一般都设总督统治，列为其国家海外领地的一部分。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在1898—1899

年的短短两年间（清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中国沿海从南到北，先后出现了 5 个租借地，即德国占领的胶州湾，面积为 230.73 平方公里；俄国占领的旅顺、大连，面积合计 2315.18 平方公里；英国占领的九龙和威海卫，面积合计 1036.84 平方公里；英国占领的九龙和威海卫，面积合计 1036.84 平方公里；法国占领的广州湾，面积为 523.25 平方公里。总之，除“约开口岸”、“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指在中国境内沿海地区、沿江河流域、铁路两侧及内陆省份，由帝国主义列强各自实际控制的范围）以外，还在中国设置的外国人居留地（如外国通商场、避暑地），以及俄国在东北设置的铁路附属地商埠（如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绥芬河等）。特别是 19 世纪末出现的“租借地”，已使中国沿海重要通商口岸和海军基地，均被列强所占领，中国主权如领土、海关权益及贸易进出口、领海权等大部丧失。正如《被侵害之中国》一书中所说，“各国在中国之租借地”，其直接之影响，为瓜分中国之开端，为危亡中国之祸源”。

当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刻，美国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而进行着美西战争，无暇东顾。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秋，美国提出了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即《门户开放宣言》），以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保护其在中国所有利益，同时美亦承认列强在华已取得的势力范围和所有权益。这个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意。因为就当时情况看，灭亡中国不容易，独吞中国也不容易，如能“门户开放”，既给自己留有乘机发展的可能，又可避免被他国排挤掉的危险。从清廷角度看，“门户开放”不失为“下策”，原因是“以各国纷索口，不如自己一律开放，索性给各国通商，还可以彼此牵制，免生覬觐。乃把直隶省的秦皇岛，江苏省的吴淞口，福建省的三都澳，尽

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

转引自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

行开埠。各国见海口尽辟，无从索要，才算罢休”。（事实不可能罢休！）“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诺”，向世界帝国主义敞开了中国大门任人尽意宰割。

从 1895—1898 年三年时间里，中国绝大部分领土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国的有识之士痛切地认识到，亡国灭种之祸迫在遐睫。挽救民族危亡的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就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

三 英人借势渗入榆关 口岸铁路权益失控

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法战争“不败而败”之教训，以及日倭吞并中国野心的总暴露和甲午之战大清帝国遭受的沉重打击，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洋务派官僚兴起了令人瞩目的洋务运动。所谓“办洋务”，原指办理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情，以及包罗一切与外洋来往事务有关的事情。60 年代以后，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它工矿交通企事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等，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和文祥等人；在地方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因此成了洋务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除执掌直隶军政大权任总督外，又领衔北洋通商大臣要职，执掌北洋上海以北各口岸（含营口、天津、烟台及后开埠的秦皇岛、青岛、大连）；办理钦派其它各项对外事务。光绪初年起，还负责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天津则成为淮系势力倡办洋务、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基地。

清王朝的封建官僚及其买办倡导的洋务运动，开创了一大批官

① 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

办或官督商办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事业，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如军事工业、采矿业、造船业、纺织业、建材业，以及铁路、港口、通信等交通业的基础。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先行发展，无疑带动了山海关和秦皇岛的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如：70年代，李鸿章等开办的开平煤矿，80年代末90年代初修筑的津榆铁路，创建山海关桥梁厂和开辟秦皇岛通商口岸及建设秦皇岛港等一批规模较大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企业。这些企业的出现，一方面为榆关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也为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加紧了在这一地区的资本渗透并与东北俄国南进势力相抗衡提供了方便。

（一）中国人创办开平煤矿与英人谋取开平矿权

李鸿章为解决其所倡办的军事工业—北洋天津机器局与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急需的燃料问题，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廷准奏创办开平煤矿（矿址选定永平府所属滦州境内之开平镇）。开平煤矿初拟“官办”，因清政府财政拮据，遂改“官督商办”。1876年（清光绪二年），李鸿章委任原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字景星）为开平总办，后升督办。翌年拟订《开平煤矿招商章程》，招商集股，章程特别规定“其股份不准西人参入”。1878年（清光绪四年），于开平镇成立开平矿务局，后迁天津。开始小批量出煤。为减少洋煤炭进口，扩大本国优质煤炭生产，1881年（清光绪七年）开平煤矿最早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机器采煤方法，产量大幅度提高。至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秦皇岛开埠时，煤炭产量已由1882年年产3.8万吨，提高到73万吨，不仅解决了国内用煤，而且尚有少量出口。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唐廷枢病故，系由李鸿章得力助手张翼（字燕谋，原候补道员，据传与西太后慈禧有远亲瓜葛，后擢升工部侍郎，内阁侍读学士，矿务大臣兼会办铁路、对外办理交涉及任过清政府驻德使馆一等参赞，其官级二品）继任开平督办。初，燕